本版编辑：杨志梁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经济学家

应该怎样去库存

□ 王东京

近来学界关于“去库存”争议不小，不过分歧并不在要不要去库存，而是对怎样去库存看法不同。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说，目前国内出现严重库存是由需求不足所致，认为去库存的重点是扩内需；而另一派说过度库存是由供给失衡引起，认为去库存的重点是改进供给。

两种看法貌似对立，但我认为他们只是说法不同，讲的却是同一回事。从需求看，产品库存增加当然是需求不足，若市场有需求，产品不会过剩；但从供给看，说需求不足是由于产品供给适销不对路也没错。市场需要的是木材，可供给的却是水泥，水泥没人买当然会压库。

所站角度不同，对库存的解释不同。问题是解释不同应对的办法会不同，所以对库存需要有科学的解释。何为科学的解释？我认为就是要用理论解释事实而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比如下雨天有人摔倒是个事实，如果你的解释是由于天下雨，你就是在用事实解释事实。科学的解释是路面摩擦力变小。这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摩擦力，下不下雨人都不会摔倒。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水的沸点。我们知道在北京烧开水到100度才会沸腾，而在高原地区，水烧到70度就可能沸腾了。若用事实解释事实，我们会说海拔越高，水的沸点越低；海拔越低，水的沸点越高。这也是用事实解释事实。科学的解释是，水的沸点与气压有关而与高度无关。即便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只要保持标准气压水的沸点也是100度。

是的，解释事实必须借助理论。问题是研究库存我们该借助什么理论？在我看来有两个理论框架可以用：一个是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架；另一个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前者可用于分析一种商品为何会出现库存，而后者则可用于分析整体商品结构为何会失衡。从简单到复杂，让我们先分析一种商品的情形。

马歇尔说，如果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双方决定，商品不会过剩。以电视机为例，若厂商的定价是每台3000元，消费者出价也是每台3000元，则电视机正好供求平衡，不会压库。反之，若厂商定价3000元，消费者出价2500元，如果此时厂商坚持不降价，那么电视机就会压库。可见，一种商品库存增加，原因是价格不能持续下降。

商品供过于求厂商为何不降价？原因是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企业就会亏损。换句话说，是厂商的销售价格被成本锁定了。麻烦就在这里，若短期内企业不降价只会增加库存，但若半年不降价企业就得限产（比如关闭部分生产线），这样就会形成产能过剩。而如果超过一年还不降价，于是企业也就成了“僵尸企业”。

以上分析的是一种产品，转从整个市场看，近年来国内为何会出现产品库存与供给短缺并存？对此我们可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来解释。瓦尔拉斯定律说：市场一定存在一组价格体系，可令全部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反过来理解是，市场若不能全部出清，则必存在政府限价或者政府补贴，从而导致了商品的比价（价格体系）不合理。

瓦尔拉斯的推断是对的。比如前几年国内煤炭生产之所以过剩，关键是煤炭企业无需支付原料成本。照理说，企业购买原料是要支付成本的，如纺纱厂需要的原料（棉花）就得花钱买；可煤炭企业的原料（原煤）却一直是免费供给，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补贴。既然原煤免费，企业当然要千方百计扩产，这样煤炭生产过剩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煤炭过剩是因为原煤免费，可国内钢铁产能为何也过剩呢？原因其实也在价格。前些年原煤价格一路上涨，而电价却受到管制，由于煤电价格不联动，这样一方面造成了电力企业亏损，而钢铁企业却享受了用电优惠。也正因如此，所以才有了钢铁、电解铝等高耗电行业的产能过剩。

再看“僵尸企业”。前文说过了，企业产品压库或产能过剩而持续亏损，如果超过一年仍不关停并转即为“僵尸企业”。为何会有“僵尸企业”存在？我的解释是背后一定有政府支撑。事实确也如此。前些年我调研过一些亏损企业，有的企业资不抵债却苟延残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保就业给了企业补贴。要是政府不补贴，企业不可能存续。

综上可见，去库存的关键是放开价格，让价格不仅真实反映供求，而且要让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时下有一种看法，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政府调结构。我不赞成这观点。顾名思义，所谓结构性改革重点在改革，是要通过改革资源配置机制调结构而不是政府调结构，否则就会重蹈过去计划经济的覆辙。

具体讲，让市场去库存有三个要点：第一，进一步缩小政府定价的范围，竞争性商品价格要尽量交由市场决定，让价格体系体现需求变化；第二，放宽市场准入、鼓励要素流动，让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第三，逐步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补贴，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

当然，政府也要同时做好三件事：首先，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的体制运行成本。其次，政府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可以肯定，做到了这两点企业库存产品便会有相应的降价空间。再次，是为处置后的“僵尸企业”职工提供保障与再就业培训。兹事体大，对此政府责无旁贷。

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坚持辩证统一，以改善生产关系为重点，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协调发展理念，以深化改革为重点，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

□ 鲁世宗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

毛泽东指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一旦失去正确理念，经济政策就会迷失在无知、短视与利益的纠结之中。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各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高频词汇。目前，地方政府倾向于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三去一降一补”，把供给侧改革和拉动需求简单对立，对其任务的长期性和改革性内涵认识不足，在实施过程中重点攻坚“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简化为企业关停并转和淘汰落后产能。学术界热衷于用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加以解说：有的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寻找理论依据；有的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供给主义为核心，简单照搬里根经济学；还有的从新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等理论进行解释。无论是强调需求侧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供给侧管理的供给学派，都有局限性，都只能参考借鉴，不能用以指导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

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符合中国实际，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超越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对立与争论，采用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分析，摆脱“用需求管理来处理需求问题”和“用供给管理来处理供给问题”的二元主义困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充分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抓住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深化改革为核心，综合使用需求侧与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工具，运用系统化思维统筹推进。

坚持辩证统一，以改善生产关系为重点，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决定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要不断完善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良好的基础和提供持久的动力。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规律出发，才不会陷入新自由主义者的错误之中，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全面取消政府管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等内容。如果仅仅从生产力这个层面上，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供给结构以实现与需求结构的对接，就没有抓住要义。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又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在于通过改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从长期看，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提高生产力；从中期看，重点推进针对要素有效投入和要素升级的改革，优化土地、资源、资金、环境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推动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实现产业升级；从短期看，政府要主动作为，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和支持市场功能的作用，克服各类市场失灵，稳定市场和社会秩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唯物辩证法认为，抓住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匹配。从总体上看，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滞后。虽然从1982年到2014年平均每年投资增长率达到21.2%，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实际形成的基础设施积累和人均财富占有水平仍然比较低。我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86位（2014年），只与泰国、安哥拉等国相当；城镇化率只有54%，与发达国家普遍达到80%以上的水平相距甚远。从结构上看，“先富起来”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升级得不到满足和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一方面，2014年我国消费者的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销售额近一半，不少民众到国外抢购商品，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还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底）不仅收入水平低，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等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的困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甚至更低，2013年贵州人均GDP仅为22922元人民币（3724美元），不及世界第110位佛得角（3785美元）的水平。现实告诉我们，马克思所预言的“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远远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诸多需求远远没有满足，不存在绝对过剩，当前所表现出的产能过剩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发展空间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如果能够充分释放，现有产能将难以满足。因此，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协调表面看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根源是发展水平低和发展不充分。

这就要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谨慎“去产能”，不能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生产能力简单地关停淘汰。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用发展的办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在着力优化结构的同时持续扩大投资，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供需矛盾，推动生产力整体上改善。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进一步加大中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必要经济活动，也是政府责任所在。当经济下行时，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各种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相对较低，并能引领、带动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从而减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要培育形成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合理产业结构。从当前社会需求来看，产业结构过低或过高，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一味地追究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要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培育，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以适应从低端到高端各个层面的社会需求。

坚持协调发展理念，以深化改革为重点，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市场供求失衡表现为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本质上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经济问题，既要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从整体调整、全面联系、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多环节寻找答案，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流通体系和消费体系。

首先，从生产环节入手，既推动企业通过向海外转移、就地淘汰、转型转产、优化重组等措施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又要善于用供需两侧加强调控引导，形成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让企业按市场需求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和产品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其次，要注重运用互联网等最新科技手段去改善分配和流通环节。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生产流程、供应链方式、销售渠道、物流体系等进行改造提升，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基础上，使企业摆脱物理空间限制，更大范围地拓展市场范围和规模，使产品和服务更加快捷、方便并符合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再次，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导向，用人民需求的满足程度来检验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加大政府和社会投入，在实现民生兜底的基础上，减小社会贫富差距，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

眼光放长远，行动在当下。学习贯彻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略是一项长期任务，必然随着实践展开而进一步深化。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悟深悟透其中精髓要义，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动，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是什么捆住了民间投资的手脚

□ 周跃辉

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力量。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民间投资年均同比增速为30.3%，而到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同比增速已跌落至5.7%，前四个月均速更是下降至5.2%。用“断崖式”下滑来表征当前民间投资的增速变化，可能并不为过。从我们到地方的实际调研情况看，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来自各个方面，最主要有四个方面：市场预期、行政审批、融资困难和产权保护。其中，当前宏观经济的整体下滑，导致企业家投资预期与信心不足，应是民间投资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一是“不愿投”，整体市场预期与信心低迷。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企业家是否做出投资的决策来自投资预期，而投资预期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决定。这里的“资本边际效率”指的是投资的预期收益。凯恩斯讲，如果我们预期会有大的变动，但又对变动的具体形式感到很不肯定，那末，投资信心必然是微弱的。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市场需求不振；加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整体需求同样萎靡，导致企业家投资信心明显不足。虽然我国政府已实行了稳健加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当前的投资贷款利息率已经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及整体经济形势的不乐观，大部分企业家对未来投资的收益率持悲观态度，大多数处于“持币观望”状态，新的投资增量就难以出现。

二是“不准投”，行政审批事项牵绊依然严重。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但从我们的实际调查研究来看，行政审批在制约民间投资方面，依然有很强的负面影响，“消评”“环评”等审批事项依然不少。一些企业家反映，现在很多地方推行“一站式窗口”审批服务模式，的确省去了企业人员分头跑路的成本，但实际上，原来关于投资的审批事项依然没有质的减少，企业将申报材料交给“一站式窗口”之后，就需开始漫长的等待，往往不知道审批究竟到了哪个环节，常常因时间延误而耽误宝贵的投资机会。此外，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石油天然气建设、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国防科工等国有资本垄断性行业，但从实际调研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无处不在。

三是“没钱投”，融资难与频繁抽贷导致资金供给短缺。近些年，国家针对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出台了为数众多的政策措施，但从整体上看，民间资本在融资难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从统计学意义讲，民间投资指的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增强企业的后续生产能力，但也会耗费企业大量的资金要素。而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因风险控制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往往对民间资本“惜贷”，而上市融资之路对一般的民间资本而言，又“高不可攀”，难怪乎众多民间资本对资金嗷嗷待哺，很多企业手中没有资金从事新的投资项目。调研中还发现，越是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态势下，银行越是收紧银根，抽贷、断贷等现象严重。尤其是银行频繁抽贷让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很多优质企业因高息贷取过桥资金或其他原因，导致资金链断裂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

四是“不敢投”，产权保护问题导致“不安全感”。“无恒产者无恒心”。资本天然具有逐利性，民间资本最关心的是辛苦投资和积累的财产或产权，能否保值增值和完整安全，能否确保不会被各种人为因素“强制剥夺”，在行政权力与法的面前，究竟如何理清，等等。事实上，围绕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财产产权、债务纠纷等问题，行政权力往往容易超越法律规范，对民间资本极为不利，而且利益驱动下的政府信用和不公平的司法执法，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往往“求告无门”“自吞苦果”。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很多企业家缺乏“安全感”。试想，一个企业家缺乏“安全感”，又怎会有信心和积极性去增加新的投资呢？在调研中，不少民间投资企业主都流露出对资本安全的担忧，很多企业专利发明得不到保护、诉讼费用成本不划算等等，都严重影响了企业家的投资预期。

或许是上述因素的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今日民间投资的艰难困境。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营改增”扩围以及与之相关的数据虚报，可能是导致民间投资加速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地方调研时，中小企业主们普遍反映，“营改增”改革之后，其企业的税负一般增加了三到四个点。这是由于当前很多私营、个体、中小企业等经营不规范造成的，导致很多企业难以拿到“进项税”的抵扣发票，使税负在短期内有所增加。从长期来看，随着国家税收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纳税的不断增强，民营企业的税负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失速”的困境，从根本上讲，“市场预期与信心低迷”源自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而行政审批、融资困难和产权保护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性原因。因此，要走出当前民间投资的困境，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快推出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一揽子”政策，尤其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有效公共投资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加大PPP模式的推广力度，以此来慢慢促使市场回暖并带动民间投资规模增长，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逐步走向上行通道，并力图在中高速轨道上企稳。研究表明，在经济下行期，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而言，更多地是“引致效应”而非“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少民间投资的审批环节，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督导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机构认真落实服务中小企业的差异化政策。同时，要加强产权保护，打造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营造公平公正投资环境，让民间资本能真正早日与国有资本“一起共舞”，获得更多“安全感”，获得更多“投资信心”。

热点透析